“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

王仁宝

【摘　　要】新世纪以来，路遥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忽略和遗忘”的现象引起了路遥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引申出“《平凡的世界》现象”、“路遥现象”的说法。几年之内，有关“路遥现象”的阐释文章集中出现，由此带动的路遥研究资料述评和汇编工作，为路遥研究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蕴蓄了力量。至2007年前后，对路遥的多样化研究形态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再解读”、对历史序列中的路遥进行纵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边缘地带路遥的实证式考察。由此形成的“重读路遥”浪潮，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暗相交织，多维度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整体化”的路遥。

【关 键 词】“重读路遥”；“重返八十年代”；共时性；历时性；整体观

【作者简介】王仁宝(1987-)，男，湖北洪湖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23.3.92～10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视域中的陕西作家群体研究”(CCNU21XJ012)。

1980年代的路遥研究在研究者与作者的强烈共振中形成了诸多具有共鸣意义的“共名”词汇，诸如“交叉地带”、“现实主义”、“高加林形象”等。1990年代的路遥研究虽然出现了一些研究路遥及其作品的学术专著，表面上呈现出喧哗的态势，但是具有相对性倾向的多元化阐释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名”状态，使得有研究者认为路遥被“忽略和遗忘”了。新世纪最初几年，虽有以“重读”名义进行的解读，如龙云的《永远的路遥——路遥作品重读》(《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王春云的《诗意的勘探——路遥创作新论》(《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赵贺梅的《中国大陆流散文学中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殖民——重读路遥的(人生)》(《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等，但多是情绪化的表达，或是对之前某些观点的重述，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读”。本文以为，真正意义上的“重读路遥”要到2007年前后，以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周昌义的《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安本实的《“交叉地带”的描写——评路遥的初期短篇小说》(《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余琪的《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论路遥的“底层叙事”经验》(《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等文为代表，初步形成了路遥的多样化研究形态，催生了“重读路遥”浪潮。

一、“重读路遥”前史及其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遇合

自2002年李建军提出“路遥还被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忽略和遗忘”[①]以来，很多路遥研究者沿着这一说法进行推进，提出了诸如“《平凡的世界》现象”、“路遥现象”的说法。2003年，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调查数据描述了《平凡的世界》被普通读者“热捧”和被精英读者“冷落”的两极接受现象；2005年，贺仲明在《“〈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一文中首次用“《平凡的世界》现象”来概括这一冷热反差甚大的文学接受现象；2007年，汪德宁在《“路遥现象”的当代启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一文中再次对“《平凡的世界》现象”进行了描述，并将之扩展成“路谣现象”：2007年李建军再次发文《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见以及路遥的经验》(《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将路遥称为“优秀的作家”,将他的作品定位为“真正的文学”,呼吁对路遥的重视与研究。在此期间,申朝晖、王文兵、贺智利等人也对路遥接受的尴尬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②]。几年之内,有关“路遥现象”的阐释文章集中出现,使得有关路遥研究资料的述评和汇编工作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2003年,梁向阳最早对路遥研究进行了综述式整理,他在《路遥研究述评》一文中按照时间顺序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进行了归纳:“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③]梁向阳对路遥研究的历时性梳理为之后的路遥接受研究既提供了研究框架,也提供了大量的索引资料。几年之内,路遥研究资料汇编出版多达六种,分别是:雷达主编、李文琴编选的《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马一夫、厚夫主编的《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建军、邢小利编选的《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军编的《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的《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申晓主编的《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在此期间还出版了两本路遥研究专著——贺智利的《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和廖晓军的《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第一篇以路遥的文学创作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石天强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师范大学,2004)。

正是李建军等人对“路遥现象”的描述与阐释,以及由此带动的路遥研究资料述评和汇编工作,为路遥研究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蕴蓄了力量。如杨庆祥所说,“刚开始路遥并没有列入我们的研究计划。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非常有意思的‘路遥现象’的具体反应,即路遥虽然在普通读者群中影响巨大,但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眼里却并非一个‘经典作家’”[④]。杨庆祥所说的“研究计划”具体指的是“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研究。自2005年程光炜为博士生开设“重返八十年代”的讨论课以及程光炜、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主持“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以来,“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系统性的学术思潮,对文学批评的学理化与史料化转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路遥作为一个典型的1980年代作家(路遥创作的发展、成熟均完成于1980年代,路遥研究的“共名”词汇诸如“交叉地带”、“现实主义”、“高加林形象”等也均产生于1980年代,而且路遥逝世于1990年代初,可以说他的生命活力终结于1980年代),在“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者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一文刊出并产生较大影响[⑤]之后,受到了“重返八十年代”多名研究者的青睐,如程光炜、黄平、杨晓帆等人多次撰文论及路遥,而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还以路遥个案作为研讨对象,召开了“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以“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视野作为择选标准汇编了《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其他很多重读路遥的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打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旗号,但大都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重读路遥”在诸多学者的呼吁与努力下日渐兴盛,已经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路遥研究学”。大体来说,“重读路遥”主要是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历史序列中的路遥、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边缘地带的路遥。具体而言,它们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面向:一是侧重于系统的论述、纵向的延伸,主要从历时性层面体现出“以小见大”的研究思路;一是侧重于横向的扩散、点滴史料的还原,主要从共时性层面体现出“积小成大”的研究思路。无论哪种思路、何种侧重点,“重读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路遥”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学理性的探究建构一个“整体化”的路遥。这种以研究对象的“整体化”呈现作为旨归的研究，可以说是“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终极目标，只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不同而已。以“重读路遥”为例，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再解读”与对历史序列中的路遥进行纵向系谱学式的梳理比较多地贯彻了“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代表者王尧的“整体化”理念，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和对边缘地带路遥的实证式考察则更多地贯彻了“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代表者程光炜的“整体化”理念。当然，具体实践过程中，同一类别的文章、不同“阵营”的研究者所用研究方法交叉的情况也时有出现。

二、基于历时性视角的“重读路遥”与“重返者”王尧的“整体化”理念

从历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重读，是“重读路遥”的面向之一，它主要是通过对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进行历时性的系统论述和将路遥置放到不同的学术谱系之中对其历史序列化来实现的。

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无疑是研究路遥的基础，不论是初读还是重读，解读路遥作品和路遥自身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主体性凸显的1980年代，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读，由此诞生的路遥研究“共名”词汇也获得了研究者的共鸣，在几近40年的路遥研究中得以不断的重释。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带有印象化的影子，那么“重读路遥”对个体作家路遥的解读则逐渐向学理化的研究路径靠拢，研究者们在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研究的某些关键词作为结论的同时，利用新近发现的一些史料，对其进行了探源式的梳理，代表人物有安本实、李遇春等人。

安本实作为一个较早关注路遥的日本学者，他习惯以实证的方式对路遥进行宏观解读。1999年，他的《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一文被翻译发表于《小说评论》杂志，文章主要以路遥的文论及生活经历为素材，对“交叉地带”一词作了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并以“交叉地带”为关键词简要而又系统地梳理了路遥的创作[⑥]。2008年，安本实又以“交叉地带”为关键词考察了路遥创作初期的短篇小说，以路遥1980年执笔、1981年发表的三篇小说《姐姐》、《月下》、《风雪腊梅》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涉及的文本包括了路遥从开始创作到《人生》发表之前的所有小说。文章认为，正是这三篇小说的写作探索，使“交叉地带”这一主题“成为了路遥迈步向前的主轴，通过描写年轻人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使他的思维敏锐起来”[⑦]。具体论述过程中，安本实首先梳理了路遥1970年代的写作，清理出了路遥在写作过程中的探索与转型，对路遥“交叉地带”书写的由来与展开的分析绵密而深刻。徐刚在安本实研究的基础上，将路遥前期“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及其辗转城乡之间的‘创伤性体验’”[⑧]与后期对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书写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路遥的完整性得以建构。而且，他通过把路遥1980年代初期创作的文本与十七年文学文本进行对比阅读，建立起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文学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得以建构。

从现实主义角度对路遥作品的解读，在1980年代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991年，李星在《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⑨]一文中对路遥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性的定位，加之路遥在创作谈中对自身现实主义者的形象塑造，使得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路遥及其作品存在较大的难度。新世纪以来，段建军、王一川、白浩、张志忠、毛尖、牛学智、赵学勇等人仍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为“路遥式现实主义”进行了不同的命名和阐释，如“新启蒙现实主义”、“晚熟现实主义”、“体验式现实主义”、“经典现实主义”、“硬现实主义”、“开放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⑩]。这不仅赋予了“路遥式现实主义”丰富的内蕴，也营构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现实主义者形象。

与1980年代路遥研究者建构的二元对立式的“社会主义新人”/“个人主义者”高加林形象不同，新世纪以来关于高加林形象的阐释呈现出整体性、辩证性、复杂性。王国彪在硕士学位论文《黄土高原上的“乡里伟人”——“高加林家族”论》(延边大学，2004)中对路遥的作品进行了系统阅读，把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纳入到“高加林家族”这一整体之中进行考察，概括其精神特质，分析促使其奋斗、造成其苦难的原因，并对“高加林家族”成员的性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格变迁史进行了历时性、整体化的归纳。孙郁、罗京在关于高加林形象重评的文章中，重点分析其自我价值追求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现代性："他是农耕文明发展当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有着原本落后的根源，但是，他又显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在精神上，但又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人'，因为他重于发展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而很少想到要顾全大局……"[11]白浩认为高加林这一合体形象在《平凡的世界》中被分解为了王满银和孙氏兄弟几个分体。从生活领域来说，孙少安坚守农村，孙少平向城市发展，化解掉了高加林形象的城乡选择困惑。从道德领域来说，孙少平是一个圣化版的高加林，王满银则是一个卑俗还原版的高加林[12]。杨庆祥则对"高加林"的复杂构成谱系进行了追溯，考证出高加林的"构成元素"有更清晰的图谱："他从于连那里借来了对等级的反抗和不屈服，从保尔那里借来了奋斗和自我克制，从少年维特那里借来了对自然和女性的爱，甚至从弗兰肯斯坦那里借来了一点点对'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不要忘记我们的高加林还是一位诗人"，"在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资源参与进来，最终合成了独特的'这一个'"[13]。以上关于"高加林形象"的重评，使得"高加林形象"更为丰满，更具有历史感，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谱系也渐趋清晰化、完整化。

1990年代对路遥创作心理的研究之风在新世纪仍有回响，李遇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路遥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更为内在的探寻，认为"焦虑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内在心理动力"，并对路遥不同创作时期的焦虑进行了追踪与确认。李遇春认为，"在第一阶段(1973-1980)的小说创作中，政治焦虑占主导地位，且得到了强烈的艺术投射，而生命焦虑基本处于蛰伏状态，偶尔在作品中被激活。在第二阶段(1981-1984)的小说创作中，政治焦虑被文化焦虑所取代，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文化焦虑与个体的生命焦虑纠结在一起，路遥的小说因此而笼罩在精神痛苦与文化迷惘的氛围中。在第三阶段(1985-1988)即《平凡的世界》的正式创作过程中，由于路遥在理性上明确择定了传统儒家道德人格认同的文化立场，因此小说中的文化焦虑基本上被消解，但由此带来了传统伦理文化规范下个体生命焦虑的潜滋暗长"[14]。李遇春对路遥创作心理的解读不仅显得更为深入，而且更为系统，举凡之前研究者所论的政治意识、时代意识、悲剧意识、生命意识等，无不是焦虑心理的投射，而"焦虑"一词作为贯穿路遥一生的关键词，也将路遥的完整性呈现了出来。

以上研究者对路遥的解读，延续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路遥的评价，但挖掘得更深更广，或是对路遥进行系统性的阐释，体现整体性的视野，或是对一个关键词进行多维度的阐释，共同营构一个整体化的概念。而总体来看，这些对路遥的整体化研究主要是以作为个体的作家——路遥为考量对象。

将路遥历史序列化，将其置放在长时段的学术谱系中进行考察，是合理定位路遥小说价值与位置的有效方式。将路遥的写作"底层化"是进行纵向谱系梳理最为常见的一种。2008年，余琪最早将路遥的写作作为"底层写作"的成熟范型进行了解读，认为"路遥的写作是一种充满热情的、以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为内容的直接的写作"，因而对底层生活的体验感同身受；路遥的写作"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以一种充满诗意的抒情性的方式，肯定那些普世的价值和普遍的人类情感"[15]。以此对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的"想象性"叙事、冰冷的态度以及擅于渲染底层生活落后、阴暗的倾向，进行了反思，以期用路遥的"底层叙事"经验来克服新世纪以来"底层书写"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底层书写"新的超越。王贵禄认为路遥的底层叙事"以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历史动机为中心，尽可能全景式地映像底层社会的方方面面"，着重"对底层人悲剧般的尊严、绝望般的希望和西西弗斯般的奋斗历程的描述"[16]，给予人极大的冲击力。王贵禄在文中将路遥的底层叙事历史序列化，梳理了从柳青到张贤亮、路遥、贾平凹等人的底层书写。程光炜在《关于劳动的寓言——读〈人生〉》一文中，"从'富士康事件'为代表的当下历史语境出发"[17]，将高加林置于进城"农民工"的谱系之中，揭示改革开放和农村转型的社会困局。白浩在论及罗伟章的文章中认为，"在罗伟章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于路遥资源的接续"，"从内容上看，罗伟章与路遥传统的接续性主要在于两个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方面，一是苦难的体验，二是底层人格的复杂性”[18]，梳理了从路遥到罗伟章的文学创作谱系与脉络。刘新锁则将涂自强归为孙少平、孙少安的“隔代兄弟”，将《平凡的世界》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置放在作为其产生背景的整体‘历史文本’中考察”，以此探寻“1980年代至今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相伴而来的，底层群体在现实、精神境遇及思想状况等方面的流变脉络与走向”[19]。在“底层文学”的历史序列之中，路遥作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都得以凸显出来。

此外，南帆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的乡村形象概括为“城乡对立的乡村”，并置于“粮食生产的乡村、战火燃烧的乡村、精神生产的乡村、城乡对立的乡村、文化根系的乡村以及含义模糊乃至矛盾的乡村”的当代文学乡村形象谱系之中，透视“乡村与现代性之间一波三折的历史博弈，察觉乡村置身于现代文化网络承担的多种含义，展现乡村如何扮演复杂的历史角色”[20]。段建军、周燕芬等陕籍学者将路遥置于陕西文学的谱系之中，从现实主义、地域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溯源与赓续[21]。贺仲明、李兴阳、罗雅琳等人则将路遥作品中的小说人物置于“新人”的谱系之中[22]。这种将路遥的写作“原点化”或“阶段化”的长时段历史化考察，体现出了更高程度的“整体化”追求，即它是以某一个长时段的文学、文化为考量对象的。

这种历时性的“整体性”研究视角与王尧的一些“重返性”研究的观点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王尧在一篇专门论及“重返八十年代”的文章中说，“‘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发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23]。这种观点的获得与他对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出现的“简单中断”这一现象的反思一脉相承，通过对处于“过渡状态”的新时期文学“源头”的考察，他认识到了过渡时期文学的复杂性，为此，他呼吁加强文学史叙述的关联性研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也抱持这种关联性研究的整体观，譬如：在《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一文中，他不仅对汪曾祺的创作进行了历时性的系统梳理，对其与“新传统”、“旧传统”的关联性意义也进行了探源与阐释；在《重读陆文夫兼论8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一文中，他对陆文夫的创作进行了整体性的概述，并重点结合其创作谈和文论，探究了五六十年代对于陆文夫以及他们这一代作家的意义。以王尧作为“重返八十年代”历时性研究面向的代表，并不是说其他具备这种研究视野的研究者都受到了王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在相关理论和实践中都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历时性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他类似的文章在这种研究风潮中可能无意识地获得了一些灵感，从历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的重读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明确打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旗号，但实质上作为“重返”类研究的重要成果汇入到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之中。

三、基于共时性视角的“重读路遥”与“重返者”程光炜的“整体化”理念

从共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重读，是“重读路遥”的另一个面向，它主要是通过对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和对边缘化路遥的实证式考察来实现的。

在路遥对其“反抗”姿态的反复标榜和研究者对“路遥在新时期文学潮流中几次不合‘时俗’的选择”[24]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影响下，路遥作为独特个体作家的身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过度放大了，而其作为社会、文化等“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其与社会、文化、文学思潮的关系没能得到应有的阐释。“重读路遥”热潮中涌现出了一拨从个案文本出发阐释路遥与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关系的文章。杨庆祥通过对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的分析，归结出路遥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说是“没有任何逃避地参与到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中”[25]。黄平认为，要“真切地理解路遥，必须意识到，无论是路遥面向时代写作的文本自身、或是作为社会症候的‘路遥现象’，都高度嵌入在8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26]。詹玲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重审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人生》,认为围绕高加林形象的不同争论,其实是持不同观念的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力的投射[27]。周新民通过对《人生》的文学史叙述的考察,认为依照"80年代"文学历史的线性叙述,并不能有效揭示出《人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人生》既有传统乡村渴望融入城市的内容,也有作为农村人祈求拥有现代价值观的心理动因,还有渐渐迈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回望与思考,《人生》既是对现代化社会图景的热切盼望,也是新的历史期个人价值受到重视的写照。上述内容相互交叉相互熔铸,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8]。笔者近年来对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发现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叙述多会出现"有名无实"或"割裂化"的尴尬局面。而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既与路遥作品的复杂性有关,也与预设式的文学史叙述范式有关[29]。此外,陈华积、金理、董丽敏、陈思、倪伟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将路遥的创作与1980年代的文学场、社会场关联起来[3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刘禾、李陀、贺桂梅、程光炜、蔡翔、孙郁、罗岗、黄平、杨庆祥、倪文尖、加藤由三纪等中外学者以路遥为原点展开了对"八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开掘,完成了由点及面的深入探讨。从不同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路遥与文学(包括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史书写等)、社会"共同体"存在着复杂关系。以路遥的个案文本作为切入点审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既揭示出了路遥的复杂性,也可以揭示出文学思潮、社会变迁的诸多史实与规律。

以上对作为个体作家的路遥、历史序列中的路遥、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的研究,虽然也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证精神,但阐释的成分仍然很大。无论研究者对路遥进行怎样客观的阐释,它总归是"研究者的路遥",如何能更靠近路遥本身呢?从路遥逝世起,对"边缘化"路遥的史料探寻就从未停止过,而在新世纪"史料学转向"的研究语境之中,这一研究倾向更为显著。"边缘化"路遥的发现既作为研究一脉汇入到了"重读路遥"的浪潮中,也为"重读路遥"提供了关键性的佐证材料,促进了"重读路遥"的开展。

对于《平凡的世界》,很多人只知道它被授予了茅盾文学奖以及被读者热捧的"今生",部分人因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获取了它"前世"的部分信息,而与之相关的更多史料都被尘封起来了。2007年,周昌义发表了《记得当年毁路遥》一文,以当事人身份就他对《平凡的世界》退稿的细节及《平凡的世界》的相关遭遇进行了回忆,这则材料对认识《平凡的世界》与文学潮流的关系等问题具有较大的价值。之后,梁向阳、梁爽也发表了《在历史现场看〈平凡的世界〉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5期)一文,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与发表过程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透视《平凡的世界》的悲剧性命运和路遥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悲壮之举。作为路遥研究的代表者以及《路遥传》的书写者,梁向阳对路遥相关史料的掌握较为全面,在这一阶段,他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关于路遥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譬如:独著《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一文,将路遥写给谷溪的六封信公开呈现在观众面前,并结合路遥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对六封信进行了解读;独著《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一文,将《惊心动魄的一幕》还原到文学思潮之中,考察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以此"证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于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对研究路遥创作的转型有着显著意义;合著《新近发现的路遥短篇小说佚作〈刷牙〉》(《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一文,呈现路遥的佚作《刷牙》,并将《刷牙》这篇小说纳入到路遥的整个创作谱系之中进行考察,认为"《刷牙》可以视为是路遥创作《人生》前关于陕北农村日常生活变革的小视角探索与尝试之作。就与《人生》所形成的关联度而言,《刷牙》也完全可以确定为是路遥的一篇重要佚作"。除此之外,梁向阳还发表了《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以〈人生〉创作中编辑与作者的书信互动为视角》(《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捕捉"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动因考》(《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等具有史料考辨性质的文章。

同时,以程光炜为代表的路遥研究"重返派"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积极发挥自身熟读路遥作品的优势，开展了对路遥相关史料的挖掘工作。譬如：程光炜因新材料的获得对“路遥1971年转让招工指标给林虹”这一“文学史结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写就《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一文，希冀引起商榷。而后，又因为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邢仪在《那个陕北青年——路遥》一文中对路遥和林虹关系的描述，程光炜对几乎被公认的“林虹主观上的移情别恋导致了路遥和林虹关系的破裂”这一“史实”产生了疑问，并结合其他事例分析林、路二人分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反对[31]。程旸对《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地点及题目的变更进行了考察，认为分析“小说创作地点和题目的变更，有助于探寻作家创作与自然环境、文化认同、社会症候等因素相互交换的秘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创作地点的选择折射出作家路遥与陕北新朋旧知的特殊关系，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独特理解”，这些都是极具隐喻意义的行为方式，以此出发可以从“对‘本地’与‘全国’、‘封闭’与‘开放’等关系的讨论”，重新理解路遥的创作世界，寻找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32]。程旸的《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则通过已有资料的梳理对巧珍的原型进行了考证与探问，并提出了“路遥会不会也是巧珍”的设问，希望通过对巧珍原型的挖掘，更好地认识路遥，深入挖掘路遥的生活世界[33]。此后，程旸又发表了《在延川、延安两份书单之间的路遥》(《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路遥在延安大学》(《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等兼具史实和阐释的路遥研究文章。朱明伟对路遥在1970年代初期与延川文学圈和北京知青的文学交往进行了考察，认为“正是在1970年代初期的延川，路遥有了文学生活的可能。而路遥最早的文学生活与文学交往，也为1970年代文学环境与文学青年的互动关系在‘地下’叙事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参照”[34]。

此外，“陕派”路遥研究者集中考察了路遥与延川《山花》之间的关系。惠雁冰认为，“《山花》作家群的成长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其中路遥最为典型。路遥成名后的‘榜样效应’，使《山花》作家群的其他作家在一种非常直接的生存诉求下开始文学创作，由此导致这一群体‘自我奋斗’的意味很浓，而这一切都与陕北地域文化有着深层的关联”[35]。马佳娜对路遥发表在《山花》上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并对与路遥密切相关的《山花》杂志进行了阐释，认为“《山花》作品中对现实的基本状态的描述，已经并非对现实实在界的真实境况的客观描写，而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内，对现实的想象性处理”[36]。由此，对路遥早期作品及文学活动进行了反思。杨辉认为，“作为路遥写作的‘前史’，‘《山花》时期’既属开端，亦在多个层面奠定了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基本面向。路遥在1980年代之后的反思与变革，属此一时段所开启之思想及写作理路的自然延伸而非超克。……‘《山花》时期’之写作路向及其在改变个人命运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路遥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现实考量。……其‘变’与‘不变’，均蕴含着文学与时代、意识形态和现实、个人命运和共同命运等有待深入探析的重要论题”[37]。

关于路遥史料的挖掘与阐释工作，近年来呈现出日渐兴盛的趋势，甚至吸引了非学院派人士的关注。供职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委组织部的姜红伟近年来发表了《〈路遥全集〉的两篇佚文》(《作家》2019年第10期)、《路遥给金谷的一封信》(《作家》2020年第4期)等与路遥相关的考据文章，涉及路遥佚文及信件、路遥与刊物或编辑的关系等话题。姜红伟的路遥考论引起了路遥研究代表人物之一李国平的注意，李国平的《路遥研究的史料问题——兼议姜红伟的路遥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一文以此为线索对路遥研究的史料问题进行了分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重读路遥”浪潮相呼应，有关路遥传记的撰写与出版也呈现出火热态势，从2013年到2022年，10年之内出版了13本路遥传记作品，分别是：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路遥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王刚的《路遥纪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后又扩充成《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长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后又修订为《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厚夫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拥军的《路遥新传——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申沛昌主编的《路遥与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申沛昌、厚夫、袁广斌的《路遥画传》(新华出版社2022年版);晓雷的《路遥别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虽然这些作品相互之间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但总归是各有特色,各有值得圈点之处。特别是《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一书的出版,在获得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郜科祥接连发表了《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3期)、《拙劣的找茬和徒劳的抵赖》(《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等文章对该书以及相关的评论进行了批评与辩驳,并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些知情人士对路遥相关史料的揭秘与考证。如李国平在《路遥研究的史料问题——兼议姜红伟的路遥考》一文中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相关情况的还原,程光炜在《路遥兄弟失和原因初探》(《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一文中对路遥"兄弟失和"事件的真伪考辨等。这种看似有伤和气的辨伪之举,实则对路遥形象的还原以及路遥研究的开展都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笔者曾在关于路遥的传记研究文章中倡议路遥研究者要善于发现有疑之处、敢于指出有疑之处,"指出这些有'疑'之处是希望研究者和读者在阅读这些材料时会对其进行辨析,做出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希望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是将'疑'史变'信'史,确保史料的真实性;二是从'疑'处发问,实现路遥史料搜集的新突破,解开这些谜团,为拓宽路遥的研究空间打下坚实的材料基础"[38]。对"边缘化"路遥的探寻,由点及面丰富了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认识,对整体化、形象化路遥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相比而言,从共时性层面对路遥的重读表现出了与"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更为密切的关系,"重返派"的中坚人物程光炜、杨庆祥、黄平、程旸等人多次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边缘地带的路遥进行挖掘、论证、阐释,最终形成了强大的路遥"重读派",对路遥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他很多类似思路的路遥研究文章大概都难逃此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吧。具体到程光炜的"整体化"理念,它与王尧的"预设式"整体观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建构式"整体观。程光炜不满足于在具体某一篇文章中呈现出他的"整体化"理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终极目的,希冀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整体性"。他"认为的'整体观',则是从'个体观'出发的","被'新时期叙述'强行拆解、撕裂和断开的若干个'文学期'"以及被人为割裂化、洁净化的研究对象,都是"能够通过讨论和辨析的工作重新整合起来,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关联点上整合起来的",因此,他认为"重回八十年代",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隐藏在那十年的'文化建制'和'思想对面设置系统'深处的差异性,进而重建各个文学期和文学现象的'历史关系'"[39]。具体到"重读路遥"这一研究论域,程光炜注重对路遥周边的考察,小至他与某一个人的关系,大至他与某一社会、文化风潮的关系,等等。

余论:"重读路遥"的未来与文学研究的"文学性"

通过对"重读路遥"相关文章及研究者的考察,可以发现:从历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系统重读的文章,体现出了较强的层次感和厚重度,但这些研究者对路遥的研究表现出"一次性"的特点;从共时性层面对路遥进行考证、关联研究的文章,单篇看来显得散乱、论述视域较为狭窄,但这些研究者对路遥的研究表现出"持久性"的特点,换言之,这种研究具有"可生长性",从长远来看,它们也可以汇聚成较为系统、厚重的整体。总体来说,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各有利弊,如能取长补短,应该会使得路遥研究能够有效地持续下去。

截至目前,已有研究者尝试交叉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杨晓帆在众多路遥重读者的启发下以路遥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交叉的研究思路,将路遥的作品问题化与历史化,还原芜杂的历史语境,探讨路遥是"以何种方式续写了'柳青的遗产',又如何将其接续到80年代的社会思潮与文学场中"?路遥又是"如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何认识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关系”，塑造新时期受城乡差别影响而处于困境之中的底层青年？[40]王璐的博士学位论文《路遥：从“文革作家”到“新时期作家”》(南京大学，2016)从历时性的视角出发，在“跨代作家”视域下对路遥文学创作展开研究，重点关注路遥由“文革”到新时期创作流变的复杂情形，考察“十七年”和“文革”时代的文学基因如何影响了作家新时期之后的写作，并对路遥的创作立场、写作姿态及其文学表现的成因予以探究。同时，又从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关注作品的外围即作家文学活动的幕后，把文本解读与对文学场的考察结合起来，以求得在立体显现作家、作品、编辑、时代等各项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揭示路遥文学创作的来龙去脉。

经过不同学者从点、线、面不同层次对路遥进行的“重读”建构，“整体化”的路遥初步完成。作为“重返”类建构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重读路遥”具备了方法论层面上的范式意义。本文也试图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一是对路遥研究成果的系统清理可以使得研究者能够全面了解路遥的研究情况，尽量避免无意义的重复研究；二是对“重读”(或“重返”)研究范式的概括与提炼可以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甚或是“重返九十年代”研究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当我们欣慰于“整体化”路遥得以初步建构完成，历时性“重返”研究和共时性“重返”研究成为一种研究范式之时，也需要对此进行冷静思考：“整体化”路遥建构完成之后怎样？“重返”研究范式固化之后怎么办？根据上文对“重读路遥”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大都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证精神。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对史料的过度依赖，也体现在形式上的历史化倾向。作为新世纪以来影响较大的文学现象之一，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表现出了对文学阐释边界与意义的规约与确认，对无序无效的文学批评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当这种“还原”历史的冲动发展到一定极致后，使得一些路遥传记的书写者误认为自己笔下的路遥才是最真实的，也使得一些路遥研究者自得地认为自己的路遥研究最正确、最权威。这种一锤定音、偏执一端的学术思维容易导致学术霸权的产生，不利于路遥多元化研究局面的形成。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都应该秉持“美学和历史的”标准，而且每个人心目中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因此，关于路遥的进一步研究不妨兼顾“美学和历史的”标准，交叉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方法，融通研究者与作者以及作品人物的情感，力求做到“知人论世”与“人文并观”。而上述对“重读路遥”的反思与延伸思考，也基本适用于“重返”类研究。其中，文学研究的“美学”标准和文学研究者主体情感的投入，对于克服“重返”研究范式固化、“重返”研究文笔枯燥等弊病一定会起到有效的作用。对文学研究“美学化”和“主体性”的凸显，也是对当下热议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较为本质化的说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学研究要从偏于“历史化”的一端走向强调“文学性”的另一端，而是在“历史化”研究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文学性”因素，实现“历史化”和“文学性”的有机融合，达到文学研究内外兼治、文史关联的整体化效果。

注释：

①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②参见申朝晖：《文学批评与接受中的尴尬——以路遥为中心》，《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王文兵：《文化消费与小说创作——从〈平凡的世界〉的阅读调查说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贺智利：《路遥的当代意义》，《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等等。

③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④杨庆祥：《阅读路遥：经验和差异》，《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⑤此文刊载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荣获《南方文坛》“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并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转载。

⑥安本实著、刘静译：《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⑦安本实著、陈凤译：《“交叉地带”的描写——评路遥的初期短篇小说》，《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

⑧徐刚：《“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⑨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1991年第4期。

⑩参见段建军:《路遥的新启蒙现实主义》,《兰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王一川:《中国晚熟现实主义的三元交融及其意义——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23期;白浩:《路遥的体验式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第1期;张志忠:《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路遥〈平凡的世界〉再评价》,《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毛尖:《〈平凡的世界〉:重新呼唤硬现实主义》,《中国文化报》2015年4月7日,第3版;牛学智:《路遥的现实主义与今天走向现象化的"现实主义"——从〈早晨从中午开始〉说开去》,《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于敏、赵学勇:《路遥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9期,等等。

⑪罗京、孙郁:《自我价值追求的多元性与现代性——重评〈人生〉中高加林的形象》,《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⑫白浩:《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

⑬杨庆祥:《路遥的多元美学谱系——以〈人生〉为原点》,《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⑭李遇春:《焦虑的踪迹——论路遥小说创作心理嬗变》,《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⑮余琪:《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论路遥的"底层叙事"经验》,《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

⑯王贵禄:《为谁写作:论西部作家的底层意识》,《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3期。

⑰程光炜:《关于劳动的寓言——读〈人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⑱白浩:《农村伤疤与新伤痕文学——罗伟章论》,《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⑲刘新锁:《从"平凡世界"到"个人悲伤"——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底层精神流变》,《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⑳南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

㉑参见段建军:《肉身生存的历史展示——柳青、路遥、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周燕芬:《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的代际衍变与艺术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等。

㉒参见贺仲明:《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从人物主体性角度出发》,《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李兴阳:《"农村新人"形象的叙事演变与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麦河〉为中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等等。

㉓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

㉔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

㉕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㉖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㉗詹玲:《看新时期两种文学价值观之争——以〈人生〉为例》,《文艺争鸣》2011年第14期。

㉘周新民:《〈人生〉与"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㉙参见王仁宝:《当代文学史中的路遥叙述问题探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㉚参见陈华积:《高加林的"觉醒"与路遥的矛盾——兼论路遥与80年代的关系》,《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董丽敏:《知识/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重读〈人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陈思:《〈平凡的世界〉的社会史考辨:逻辑与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倪伟:《平凡的超越:路遥与80年代文化征候》,《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等等。

㉛参见程光炜:《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㉜程旸:《写在陕北——对路遥小说创作地点及题目的考察和反思》,《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

㉝参见程旸:《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㉞朱明伟:《路遥延川时期的文学交往(1969-1973)》,《当代文坛》2019年第3期。

㉟惠雁冰:《〈山花〉现象与〈山花〉作家群》,《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㊱马佳娜:《国家的神话:"山花"作家的意识形态叙述——以路遥早期作品及文学活动为中心》,《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㊲杨辉:《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㊳王仁宝:《传主形象塑造与传记疑点辨析——路遥传记研究》,杨正润主编:《现代传记研究》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42页。

㊴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㊵杨晓帆:《路遥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